

“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下)

李若虹

欧洲汉学传统 1960 年代之后在哈佛的境遇，在费正清的回忆录里清晰可见。其实早在 1930 年代的后半期，伯希和就意识到了欧洲汉学面临的危机。这在二战后的美国得到活生生的应验，原来传统意义上的汉学研究远远不能满足二战以后的国家和社会需求，在学界逐渐消隐。从 1950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柯立夫和杨联陞当然难以回避这一股新的学科发展潮流。

哈佛任教

1940 年代中期，正当贾德纳离开哈佛远东系四处求职时，柯立夫和杨联陞都已受哈佛燕京学社的正式聘任，开始了在远东系三十余载的教研生涯。从此他俩都没有离开过哈佛。

1946 年，柯立夫完成兵役后从中国回到哈佛继任助理教授，开设中文、蒙古文、宋元文选读和《四库提要》等课，他漫长的教研生涯全面展开。而 1947 年 7 月开始，杨联陞也正式被哈佛燕京学社聘为远东系的助理教授，任期五年。对他个人生活来讲最重要的是接受了这一聘任之后，杨联陞终于能让妻子和小女来美团聚，开始在康桥安居乐业。

到 1949 年初，柯立夫已被考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当时为终身教职），并顺利通过。作为同事，杨联陞还为此给柯立夫写了推荐信，他特意指出柯立夫精通多种语言和亚洲学，许多中国学者称他为伯希和的继承人，堪称蒙古学领域的一位领衔学者。柯立夫在教职上可谓平步青云，1953 年，由于在蒙古学方面的贡献，柯立夫还荣获法国汉学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

1950 年 1 月，当杨联陞被考虑由助理教授晋升为永久的副教授一职时，柯立夫为此写给费正清的推荐信里写道：“他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一位完美而又令人非常愉快的绅士（a brilliant scholar, a perfect gentleman, and a thoroughly delightful person）。”柯立夫对杨联陞的学问和为人充满了敬佩。

对这一段学术生涯，杨联陞自己也认为从 1940 年开始的十年是他“打入西洋汉学界最用力的时期”。1951 年，杨联陞春假游欧，见到了许多汉学界的同仁，得到他们赏识，杨联陞自己解释说：“因为这时我对所



柯立夫与洪业在哈佛 300 年校庆中国校友捐赠的纪念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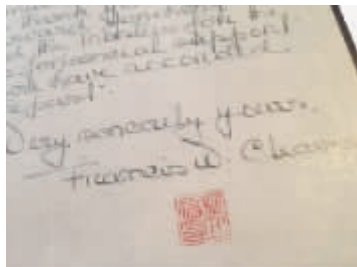
谓西洋式的汉学，似乎已开始及格了。”他访问英国时，见到了已经从剑桥大学荣休的慕阿德。慕教授问他：“你想我们西洋人真能读懂中文吗？”杨联陞说：“岂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浅而已。”这可是他对西方人做汉学的一番客气话。

英国的汉学界非常器重他俩的学问。柯立夫曾在 1952 年应邀前往英国的剑桥大学任教，剑桥大学想让他接任夏伦（Gustav Haloun, 1898—1951）的汉学讲席，但是他回绝了。之后他就一心一意任在远东系任教。柯立夫婉言谢绝后，剑桥大学又给杨联陞发来聘书，杨联陞同样谢绝。但是能和柯立夫齐名得到剑桥大学的邀请，让他非常高兴。

除了教书、著书立说之外，他们两位还一起担任《哈佛东方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编委。《哈佛东方学报》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研究的窗口，两人在承担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在上面发表多篇论文。柯立夫在 1956 年晋升为远东语言教授（Professor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后，他在中亚研究，尤其是蒙古史和蒙文方面已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专家。他在东亚系的学生康纳（Timothy Connor）说，到 1950 年代，所有关于蒙古帝国的研究资料都是三手、甚至四手材料，也就是从蒙文翻译后再转译的材料，根本没有人了解原始的蒙文史料，正是柯立夫毕生精雕细作的努力和对蒙文原著的敬业研究为这一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称他为美国蒙古学的创始人和鼻祖，实不为过。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称他为“国际学术界研究古蒙古语的举世无双的大师（an unequalled master）”。1960 年代，他一直很想增加蒙古文史的教员。1964 年，柯立夫决定在下一学年添上一门近代外蒙白话文课。

1960 年代可谓杨联陞的学术高峰期。1962 年，他应戴密微之邀前往巴黎用法语做了四场大型公开演讲，当时被学界称为“中国的戴密微”，还收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



柯立夫的签名和印章，曾用名柯立福

亚大学的特邀聘任书。

1965 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为了挽留何炳棣，校长乔治·毕都（George W. Beadle）和副校长李维（Edward H. Levi, 1968 年继毕都担任校长）一起找他谈话，愿意尽所有可能，全力支持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中国史教研。他们直截了当地说：“由你建议，怎样才能把芝大中史教研真正做到举世无双（指质不指量）。”何炳棣说：“此事并不难。只需要从哈佛挖出杨联陞一人。”何炳棣当时对杨联陞的评价是：“他不是一般所谓的历史家，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汉学家，虽然他主要的兴趣是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两人联合的拳击力，决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何炳棣甚至都说：“杨如来芝，哈佛传统中史行将垮台。”此时，杨联陞在美国汉学界威望很高，被称为“西方汉学的警察”，也有说他的声誉和影响“如日中天”。

在何炳棣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麦克奈尔（William McNeill）马上给杨联陞发来邀请，信中的措辞充满求贤若渴之意。杨联陞在 4 月 7 日午后收到信，在日记里写道：“（系主任说）学校对出版绝不加压力，教书等不会太累。意思颇诚（只用 salary and title 字样，比较含蓄）。”他马上找东亚系的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系主任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代理社长白思达（Glen Baxter）谈，他们都建议杨联陞“应与学校讲价”，他也有点心动，可是反思道：“似已走上非讲价不可之路，自己亦觉可笑也。”

为此哈佛文理教授院福特（Franklin L. Ford）院长马上行动，不仅答应加薪，授予他“哈佛燕京学社讲座教授”的头衔，还说他以前晋级一事学校对他有所亏待，而且原则上同意他的请求，考虑增加中国史的教职。杨联陞借此机会向院长直面推荐余英时为在中国史方面的候选人。杨联陞还在私下里就此和柯立夫长谈，柯难免觉得失落，跟杨联陞说了一通责怪哈佛的薪水过低，自己要提早退休之类的气话。之后一周内杨联陞当机立断，决定留在哈佛。他自己为此也松了一口气，说“即为告一段落矣”。

即使杨联陞芝加哥大学之行未成，甚至根据何炳棣的回忆录，他们之间始于清华园的情谊从此蒙上了一层霜，但是多年后，何炳棣对杨联陞的学术评价之高，丝毫不减当年。他跟母校介绍杨联陞时说：“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最早成名者是 9 级的杨联陞。杨才思敏捷，博闻强记，精通日文，既能大量利用日人研究成果，往往又能指摘其史料或诠释之不足，任教三十余年间写作广涉经济

（下转 3 版）➔

策划：

文汇报理部

执行编辑：

李纯一 lic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

北齐娄叟墓壁画
（局部），山西太原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报

